

研究領域內乾坤：女性、中國、歷史與「之後又如何」問題

賀 蕭

摘 要

在 2004 年 11 月號的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AS)* 中，我發表了一篇名為〈研究現況〉的論文，討論約五百篇關於 20 世紀中國女性的學術近著。本文參考卻不重述那篇文章。我所採的其實是一種延伸的事後反思方式，以及在悚然不安的狀態下所作的一連串針對近代中國女性研究的建議。我們不該認為，讓性別看得見、聽得見就意味著研究的終結。但如果重視過去三十年來我們所認識到的一切，我們就不能將「性別研究領域」當作成一個疆界確定的空間來繼續挖掘。若將此「領域」視為遇合 (conjuncture) 而非空間，也許更適當。此一遇合的出現、強度和複雜性並非一成不變；對學者來說，這些都與主體形成的其他過程的勾勒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將來也必繼續如此。

何以有此研究熱潮的迸發？何以是現在，又何以在中國領域之中？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啓發了什麼，又可能使我們忽視了什麼？我們要如何令此領域的探索保持開放，寧冒使其消失的風險，也不描劃其疆界而使之封閉？若我們要求有一種強力的滲透性，或設想有一個和我們一樣隨著時間而出現、轉變和消逝的探索對象，我們可把哪種新問題帶進視野呢？

關鍵詞： 性別、婦女、中國

研究領域內乾坤：女性、中國、歷史與「之後又如何」問題*

賀 蕭 著

余芳珍、葉毅均、莫亞軍**翻譯

在 2004 年 11 月號的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AS)* 中，我發表了一篇名為〈研究現況〉的論文，討論約五百篇關於 20 世紀中國女性的學術近著 (Hershatter, 2004)。雖然大家曉得，任何寫作計劃都費工耗時，但出乎意料之外，這項工作卻惡夢似的遠超過我最悲觀的預想。1996 年，Ann Waltner 和我同意將以英文撰寫的大量中國女性研究，區分為 20 世紀之前和 20 世紀兩部分，這個區分反映了學術圈內的現在主義偏見。我們認為，若我倆分別評述二十本／篇具代表性的專書和論文，並寫成兩篇二十頁的文章，便可為 *JAS* 讀者提供極大的方便。其後這類學術著作層出不窮，我們的進度也隨之延宕，難望追上出版步伐。這個計劃繼續多年，Ann 最後成了 *JAS* 的編輯，也因此變成不合適的催稿者，且因過於忙碌

* 本文初稿由余芳珍、葉毅均合譯，修訂稿由莫亞軍翻譯，謹致謝忱；對葉漢明教授撥冗校訂，尤特此申謝。

** 余芳珍，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與宗教研究系博士班研究生；葉毅均，美國紐約大學 (NYU) 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莫亞軍，美國聖克魯斯加州大學 (UC Santa Cruz) 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而無法完成前現代的部分。我則繼續苦幹，完成了刊登在 *JAS* 的 75 頁討論文章，另一個稍長的版本將刊登在 UC Press e-publication 網站上。這是一場賽跑，我試圖在桌上的新出版物，再使工作令我不勝負荷前，把文章推出。只要我稍緩進度，作者的電郵便湧到，追問我為何不把他們的作品收入那篇文章中。

本文參考卻不重述那篇文章。我所採的其實是一種延伸的事後反思方式，以及在悚然不安的狀態下所作的一連串針對近代中國女性研究的建議。「賦中國以性別意義」的研究計劃啓發了數代學者，我也是其中一位。性別已經鬆動了早期的史學常規和敘述，使之瓦解、不勝其擾，並且使某些包住一個論述世界的外衣清晰可見。在那個論述世界中，「人」通常泛指（未加標記的）男性。我們不該認為，讓性別看得見、聽得見就意味著研究的終結。但我想要告誡那些試圖界定該領域、評估其現狀、描繪其缺口並進而填補這些缺口的所有衝動，如果重視過去三十年來我們所認識到的一切，我們就不能將「性別研究領域」當作一個疆界確定的空間來繼續挖掘。若將此「領域」視為遇合 (conjuncture) 而非空間，也許更適當。此一遇合的出現、強度和複雜性並非一成不變；對學者來說，這些都與主體形成的其他過程的勾勒，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將來也必繼續如此。



自從我在 *JAS* 的論文出版後，有三個問題促使我思考此「領域」，視之為一個特定的遇合¹（具有自然消融的性質）而非一個固定的知識體：

-
- 1 在此我使用「遇合」(conjuncture) 一詞，依據的是 Hall 及其他學者對 Gramsci 用法的發揮。在 *Passato e Presente* 中，Gramsci 將「遇合」定義為「在一特定階段內決定市場的一系列情況，假如這些情況被理解為處於運動之中，即構成一種不斷變化的組合的過程……『境況』(situation) 與『遇合』(conjuncture) 的不同在於：遇合是經濟境況的即時而短暫的一組特徵……。」Gramsci, 1971: 177, n. 79. 為了這個針對女性研究的討論，我要鬆開（而不是切斷）與市場的連結，同時維持再組合、流動和多種決定因素的說法。在集中注意時間的變化而非空間的固定時，我也許只是

(1) 和我談論此問題時，研究日本的史家 Karen Wigen 驚訝地問：「爲甚麼在日本研究領域中，我們沒有這類問題呢？」

(2) 在我的革命中國課上，一位本科生在他所交的期末作業中，爲一部有關中國的歷史小說彙編了一些背景資料。他選擇去研究一個虛構的鋼鐵業工人階級男性的生活。在反映研究上的問題時，他問何以尋找有關上海妓女的資料比尋找上海下層社會男性的資料容易得多。

(3) 最近在我擔任訪問學人的大學的一個圓桌會議中，一位人類學同事批評說，我在 *JAS* 的論文並未指明哪位學者的研究特別傑出。因此，他說，文章「讀起來像教科書，而不像研究現況」。他拿我的做法與幾年前一位在中國研究領域裏赫赫有名的政治學家所作的一個演講相比。在那篇演講裏，該政治學家爲研究者定出一個詳細的研究方案。這位人類學家問，爲何我要避免下判斷或給予指導？一篇關於研究現況的文章，不也應是該領域未來狀態的一種評估和介入嗎？

對以上三個問題作反思，得有一個與我們過去幾十年研究現代中國史中女性時，所學到的多少有些不同的取徑。所引發的問題並非關於一個「領域」的內涵，而關乎它的出現條件及形態。關乎何以某些問題先湧現，而其他問題則被忽略？何以有此研究熱潮的迸發？何以是現在，又何以在中國領域之中？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啓發了什麼，又可能使我們忽視了什麼？我們要如何令此領域的探索保持開放，寧冒使其消失的風險，也不描劃其疆界而使之封閉？若我們要求有一種強力的滲透性，或設想有一個和我們一樣隨著時間而出現、轉變和消逝的探索對象，我們可把哪種新問題帶進視野呢？

重新訴諸歷史學家愛用的工具，但對我來說似乎有必要堅持其暫時和偶然的特性，否則它就會變得具體化，甚至像一個「知識體」般形體化。

何以有此熱潮的迸發，何以是現在， 又何以發生在中國領域中？

為何有關中國女性的研究，以及相對較冷門卻依然吸引了一定注意力的性別研究，成為持續關注的焦點？就如我在 *JAS* 的論文中所言，「它是在中國及其境外成長的女性研究中，在性別作為一種分析範疇的爭辯中，及其與性和性態 (sexuality) 問題的不自在關係中，在關於能動性 (agency)、抗爭、主體性和發聲 (voice) 的跨學科討論中，及在女權活動、社會主義的消亡以及後殖民學術的發展中豐富起來的。過去三十年中，對於中國和海外學者，到中國搜集可利用的原始資料或進行實地調查的機會越來越多，從而促進了學術對話。這種對話有時相互交叉，有時卻循著完全不相干的軌道而進行。」(Hershatter, 2004: 991)

這種學術潮流的交匯激發起新問題的湧現。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革命家和其後研究中國的學者所關注的失敗國家，與隨之而來的革命需求 (1949 年之前)，以及革命政權的擴張及其成功與否 (1949 年之後) 等方面，現在都有了新問題。即使在人們關注這些研究熱點的早期，女性地位就以衰弱國家的主要徵候和強盛國家的主要表徵而出現。早在中共國家及其政策出現前，「女性問題」的焦點已從中國國家形式的評論，逐漸轉變為中國文明本身的批判。在 19 世紀末期，梁啟超提出他著名的說法，宣稱中國因其衰弱的文明而遭受擴張性西方的打擊，它之所以衰弱，部分原因在於纏足而被禁閉的中國女性並非具有生產力的國民，而是寄生蟲。事實的準確性對此論證來說並不重要：梁啟超為了作此論證，忽視了農村婦女和菁英女性在家庭中 (對所有人來說)，和在家庭與市場的互動中 (對較窮的家庭來說) 所提供的大量生產力。不過，他將女性和文明的健全性與國家的存續聯繫起來的說法，則被其他人熱情地接受。

最後，這個聯繫在高彥頤稱之為「五四的故事」中被闡發。² 這故事在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及其政治衍生物 (最終包括中國共產黨) 口

2 Ko, 1994. 自此，在一些最近的論文裡，她對這一主題有更詳細的闡述。

中的內容如下：中國文明被束縛於使人無能為力的階層制度下，在儒家（之後是「封建」）思想的重擔下，女性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此種無能的象徵。只有藉廢除階層制度，中國人民及其國家組成才能擺脫無能狀態並且「站起來」，如毛澤東在 1949 年所說的一樣。在這個故事中，中國女性既是使人無能的意識形態和實踐行動的受害者，又是無能的所在，是落後和愚昧、需要改革的對象。

對於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較為無力的對手國民黨）來說，女性的地位和待遇被當作國家建構的進展指標。學者（尤其是留心女性主義的學者）再次採用這個故事，追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策的轉變，並追問：這些政策如何影響女性？他們的改革有多成功？有多甘心讓性別從屬於階級？隨著 20 世紀八〇年代早期經濟改革的開始，女性研究學者繼續追問諸多同類問題，即使對於社會主義忽略女性的現象的關注，已因國家可能已完全放棄女性，致使她們被全球資本主義所掠奪而產生的沮喪感所取代。

在某些（但並非全部的）學術圈中，晚近的全球化正取代中國政權成為歷史的動力。學界最近的問題已大多變成：全球化如何影響女性、賦予女性能力或（更經常地）不利於女性？此種將焦點移離國家的轉變尚未一致。對於中國大陸的女性研究這個新興且相當活躍的領域來說，國家仍被認為應為其政策對婦女的影響負一定的責任。或者，國家仍是主要的行動者，但也許這是首次國家得為性別理由而負責。在中國大陸學界中，改革對婦女的影響仍在很大程度上被設定為國家範圍內的辯論，儘管此辯論深受發展、賦權（empowerment）和女性主義等跨國理論的影響。

對於以美國為基地的學界，包括一些僑居海外的學者來說，對全球化的批評如今遠多於對中國國家的關切，這個國家不再像是個社會主義浪漫傳奇中的伙伴，或女性解放的想像性指路明燈。勞動大軍中的女性、流動女性人口、新興跨國婚姻市場中的女性、及性交易中的女性等皆加入有關全球化的更為寬廣的對話中。全球化力量通常被視為反面角色或者至少是不負責任的力量，必須接受責問。但即使主要行動者有變，敘

述的弧線仍顯出與先前關於國家的故事有重要的連續性。在許多此種學術研究中，主導問題仍是：某種更大的力量如何塑造了女性所能有的選擇？

可能因為中國黨國政策的曲折多變，及其與世界關係的變化不定，相對於日本有關的學術書寫，中國的女性研究顯然熱鬧得多。日本政府從未作過那樣明確的有關女性或代表女性的宣言，將自己表現為世界演變的進步代表，從未經過數次戲劇性的路向轉變，或在過去的二十年裏突然冒起成為一個新興勢力。中國國家的變動形構持續吸引著中國研究學者的注意，而梁啓超認為女性是國家成功的首要指標的想法，則深深地吸引了我們。女性主義學者即使立意撰寫社會史，力圖擴大探索的範圍，以超越國家中心的歷史，也並非如我們樂於想像的那般遠離以國家為中心的故事。

但是何以會有這個使我的 *JAS* 論文那麼難以完成的知識生產爆炸？中國改革開放顯而易見的刺激，已經改變了中外學者學術工作的條件，性別甚至出現在中國媒體、國家內部，以及女性研究學者、社會工作者、法律專家和勞工分析家之間的新辯論核心。對於外國人和過去十五年左右在中國工作的學者來說，另一個因素是以下需要關注性別的學界：女性主義學術、從屬群體研究 (subaltern studies)、心理分析、後殖民理論、性態研究 (sexuality studies) 及其他。因此，我的學生才會抱怨近年的出版物對於 (女性) 性工作者的關注遠甚於男性。

學術界和國家建構的大趨勢形塑了關於中國女性的書寫。這兩方面加強了我們在某些地方的描述，但同時也使得其他部分的描述顯得不足夠。

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啟發了什麼？ 又可能使我們忽視了什麼？

以下三組主題搭配主宰了有關 20 世紀中國女性的研究：女性與婚姻／家庭／性態，女性與勞動、女性與國家現代性。每組主題都激發了傑出學術研究，其中有些我已在 *JAS* 的論文中討論過。每組主題也代表了

一個問題。

首先，女性與婚姻／家庭／性態一組集中關注的是 20 世紀實地考察和文本材料，傾向於假定有一個不受時間影響的投射，以某些特定模式退到模糊的過去中，而人們按階級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受到在二〇、五〇或八〇年代所發生的巨大顛簸影響。在這裡，無時間性就是問題所在。

其次，女性與勞動一組，大部份環繞著 20 世紀的經濟重整和政治運動而組成，但迄今尚未與逐漸出現的帝制晚期／近代早期的相關研究建立聯繫。後者已有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1997)、曼素恩 (Susan Mann, 1997) 和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2005) 等研究範例。他們認為女性工作模式的時間性，不會弱於上述的婚姻模式。

第三，女性與國家一組最直接與宏大的革命敘述糾纏不清，而「國家」一詞則顯示此組別乃一現代建構。前已述及，「女性與國家」的故事與新文化／五四運動一同開始，並且或多或少（視乎由誰書寫）與革命運動的發展步調一致的地前進。（在一些敘述中，五四前有一短暫的英雄式女性革命活動風潮，它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湧現。）這個故事基於兩項根本主張：第一個主張多由捲土重來的女性主義史家提出，認為「女性也在那裡」，是每個重要革命時刻的參與者。第二個主張認為女性長期以來被「儒家社會」所壓迫，唯有革命才能解放她們。描述這個故事，讚頌革命的成功，或檢討其失敗等工作，催生許多我在那篇 *JAS* 的文章中提及的學術成果。然而，「無論好壞，國家塑造了女性」的公式也許已經走到末路。至少，它需要結合一些新問題進行探討。

20 世紀的革命敘述如今多少已支離破碎，這不僅是因為那場將 20 世紀一分為二的革命已幾乎宣佈結束了。我們現在知道，1895 年本身並非標誌著一個世界的完結；今天 1911 年更多被視為一個延伸的過程，而非以往所理解的革命性轉變。中國共產黨在早期勉強地團結，往後則常往數百個地方化且互不相容的方向前進；國家建構的活動其實是清朝統治者、推翻他們的革命家、國共兩黨等的共同議程。20 世紀宏大革命故事的凋零，勢必令人質疑以女性為社會危機或革命成功指標的看法能否成立。注意到（小寫的）女性和作為國家主體的（大寫的）女性，在過去

會被那些我們嘗試跨越時間去理解其生活的人視作這樣的指標是一回事，我們自己這樣用女性或作為國家主體的女性為某種指標，則是另一回事。

我們要如何使此探究領域保持開放， 甚至冒著使其消失的風險，而非描劃其界線而令其封閉？

爲了要說明這個認識論的問題，首先我回到那位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對我所提出的挑戰上。何以我不作更多評判？這並非因爲缺乏關於學術研究品質的意見。我認爲文中討論的作品大多是經過徹底研究和清楚論證過的。的確，某些作品讓我想辯駁，而某些則較諸其他作品更爲可喜好讀。但是讓我對此一學術熱潮感興趣的正是它的萌芽、生長，和多少有點混亂的本質。儘管女性研究已走向更廣更深的境界，它在題材、方法論甚至結論的範圍上，卻不易設計爲一個進步性的敘述。反之，問題、取徑和答案的多重性顯示了其他東西：學者在廣泛的討論範圍中提出有關性別的問題，其中許多問題超越中國領域的地理焦點。統合這個學術的是（借用並扭曲 Judith Butler 的語句）作爲一個干擾工具的性別。有學者問，對性別的關注如何干擾我們的政治發展故事，例如中國共產黨的興起？或我們的經濟成就的故事，例如市場改革？同時，對中國的關注如何干擾曾被精巧製作來解釋歐洲或北美事件，或被殖民的南亞或東南亞的性別故事？同樣引人入勝的是：那些關於中國性別的較早期故事——如五四故事——的批判性關注，將如何使我們警覺到這些故事對中國民族國家建構所發揮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作用。若我們回去挑戰那些在主體構作和可見性的熱潮中突然迸發的，有關受壓迫的、沉默的、纏足的、未受教育的中國女性故事，那麼大國族敘事哪些其他部份會鬆脫呢？

那麼，這個領域，或（如我先前所言）這個遇合的特色，在於以性別爲方法，就如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研究者以酷兒爲方法一樣。從一個角度入手，在已建立的中國領域裡探問有關性別的問題，極有利於新

知識的產生。

用性別和中國來思考，也是對女性史及包含它的女性研究領域造成干擾的途徑，儘管真正的對話仍需進一步的認真努力。在女性研究領域裡，針對歐洲中心論、殖民遺毒和對種族的漠視的批判，到目前為止已有充分操練，且在實踐習慣上有明顯的功效。例如，自 1973 年起三年一度的女性史 Berkshire 會議（“the Berks”），至少自 1980 年代以來，已歡迎有關其他地方的女性歷史的專題小組。1984 年我在該會上發表我的第一篇論文，猶記得自己對歐美女性史專題小組，與僅得一兩個的中國專題小組間的不同所感到的驚訝：所有的女性歷史主體皆有中間名字、有組織的檔案、以及龐大的個人信件收藏。在最近二十年間，Berks 計劃已有重大的轉變，2005 年的會議名稱——「無邊無界：女性歷史，全球對話」——便是個標誌。我發現在會議程序表裡，只有一個專題小組是完全專論中國題材的，題目是 20 世紀初期的革命烈士秋瑾。但經我粗略計算，217 個專題小組中，91 個在範圍上是比較性的或跨國性的。³ 在比較性專題小組中有 16 個涉及中國。其中有些小組的比較是頗牽強的，例如：一篇關於宋代名妓的論文與（地點不明，大概是關於美國的）「性工作的『刺激』與『刺痛』」（“The ‘Thrills’ and ‘Tinglings’ of Sex Work”）被編在同一組（第 16 組）；一篇討論近期臺灣政壇傑出女性的論文，與兩篇關於 19 世紀阿根廷女性，及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女性的文章被編在同一組（第 80 組）；宋代女織工的論文，與美國新政時期的南方女性，及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女性的論文並列（第 215 組）。其他小組環繞著眾多國家的發展或社會運動而作專題討論，中國則是一系列的國家研究個案之一，有關題目如下：女性與專業醫療人員的相遇（第 29 組），或與外國傳教士的相遇（第 214 組），性別的國族想像中的醫療知識（第 97 組），女

3 一共 91 個專題小組中，14 組是關於殖民或新帝國政權的，16 組是包括中國的比較性專題小組，另有 61 個其他專題小組。勉強過半的小組仍集中討論北美，但其中許多小組關注族群與種族差異或互動的問題。尚有少數關於單一地區的專題小組：16 組有關歐洲、4 組有關日本、3 組分別是印度、中東和非洲、2 組關於散居各地的猶太人、1 組關於澳洲和紐西蘭。每組總數可依界線而調整，因某些小組可以數種方式來分類。Sin Fronteras, 2005.

性身體的建構 (第 38 組), 跨國殖民史 (第 108 組), 貧窮女性的宗教信仰 (第 118 組), 娼妓與改革運動 (第 187 組), 女性在國內的遷徙 (第 178 組), 跨境收養 (第 115 組), 爭取選舉權運動 (第 209 組), 全球女性主義 (第 71 組)。

女性的歷史很顯然不再主要是北美的事業。然而, 這些專題小組無論怎樣具有良好意願和潛力, 仍顯示有進一步製造干擾的必要。我們要如何從並列國家個案的研究方式, 開展至嚴肅的比較或 (更好的) 交流? 跨國現象 (醫療專業、娼妓改革、參政權) 如何經由人們、文本、影像的移動和其他媒介而流傳? 此種流傳的方向性為何? 特別對中國而言, 我們如何計量不平等? 這裡我只提出一個構想性的問題: 我們應否將此一流傳理解為看來大多是單向流通的觀念 (從宗主國到半殖民地; 在此殖民者擁有知識優勢, 也由他們訂立條件), 還是將其理解成不平均的世界主義 (在此, 半殖民地比公認較它們文明的統治者, 更精緻奧妙和具多重文化)? 當考慮到檔案、敘述、社會運動、性別化主體建構常依國界而組織其內容時, 我們可以怎樣干擾以國家為基礎的性別研究架構? 半殖民地的性別議題是否有別於殖民地的, 若然, 後殖民理論又有甚麼含義和限制?

在目前的女性史研究裡, 正如 Berks 專題小組所反映的, 我們仍然只有排列成隊而非深思熟慮的關係, 只有流傳觀念的單向度, 而非精密描繪的交相互涉領域。上述兩項缺失對被稱為 (未加標記的白人) 女性史或 (在文化或國族上固定的) 中國女性史的密封領域來說, 已是一種改進, 但是繼續保持「性別」(多樣化和本土化的形塑, 在整段時間中有參差的可見性和重要性) 和「中國」(透過經常跨越國界的交往而形成和再形成) 範疇的開放, 則是有益的。

那麼對於思考中國, 或從中國出發來思考 (作為處境知識), 或連同中國一起思考 (一如用中國來思考) 的人來說, 作為方法的性別尚未窮盡其可能性。但就我的判斷而言, 以性別為干擾的做法, 只有在對其他造成干擾的形式保持開放的情況下, 才是有用的。以「中國女性史」或「中國女性研究」為名的學問領域, 極易被視為一個具有空白部份的盒子、

網格或地圖，而學者的工作則是去填補空白，或僅以他處的性別地圖來接合其連結點。這種關於女性的封閉故事，極適合課程大綱裡專講性別的一堂，或歷史系課程裡有關女性的單一科目，否則它們只會喋喋不休地講那些關於（未加標記的）男性的故事。正是此種對授課大綱或歷史課程，甚至是寬廣的知識領域造成干擾的能耐吸引了我。同時，孤立於其他問題來關注性別，將冒著假定性別為穩定、基本、固定之物的嚴重智性危險，從而損害其深刻的歷史性、可變性、處境性等使這個研究領域有趣和強有力的首要因素。

隨著研究中國的女性主義學術的發展，它已形成一個具有自身邏輯、議程和語彙的研究領域，從事研究者會先彼此對話。這種對話是有益的、具刺激性、有趣而絕對必要的，但這還不夠。它縮窄了發動挑戰的義務，也限制了思考性別是什麼或可以是什麼的挑戰。

女性研究的學術獲得成功，可能在實際上削弱了批判力度，或對批評的接受程度，令人感到不安。這種情況可與有關女性研究計劃／科系在大學課程中的地位此一更為廣泛和熱烈的討論相比。幾年前，政治理論家Wendy Brown對發展一個融貫的女性研究課程，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戰。其中一項內容是「當代女性主義學術並非單獨在其領域內對話，而是分別與不同的知識範圍或理論體系交流，這些知識領域或理論彼此並未時常交流」；另一項則包括「對性別範疇的穩定性提出的理論上的挑戰，以及對與種族、階級和社會認同的其他標誌無涉的性別論述提出的政治上的挑戰」。⁴ Brown接著提出女性研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願景，正正存在於這些挑戰之中，當它被制度化，而且界定「女性」為分立且

4 Brown, 1997: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 她繼續指出「在學界裡極度的重要政治時刻，也就是女性運動挑戰學術研究、課程、準則與教學法中，無所不在的厭女觀念、男性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時刻。無可辯駁地，作為這些做法的批判者，女性研究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思想上的創造性。然而，女性研究作為一種當代體制，也許在政治和理論上並不融貫，且有不言而喻的保守性——之所以不融貫，乃因在定義上，它將不可界限的『女性』界限為研究對象；之所以保守，乃因它必須抗拒所有針對這種界限的異議，如果它要維持其研究對象，作為它存在的理由的話。」

可歸類的研究對象時，這種願景便將不再了。⁵

同樣可以問，也應該問的是，女性研究——乃至，簡單而言，性別研究——如何在「中國領域」(在此以括號顯示所謂「中國領域」，作為一個分立的範疇，它也有類似問題)內定位。唯有在我們使性別成為可見，並同時追溯性別與其他主體形成模式——例如中國性，或菁英的／受教育的、又或農村的身分認同——的關係，性別才能維持其作為分析工具的用處。如Brown所言，「儘管有依據種族、階級、國族、性別等多樣化且有時甚至互不相關的主體形成，主體建構本身並不會在分立的單位，如種族、階級、國家等之內發生。因此，據以理解特定主體／從屬性的建構的權力模式，絕不具體描述或追溯一個活生生的主體的輪廓。」⁶

如果我們所追求的是活生生的主體——具有雜亂糾結的特性，我們就不能單獨以性別分析來勾劃，也不能滿足於「中國性別」的討論，彷彿中國和性別這兩個詞彙在此一短語中是穩定不變的。當一個歷史性主體(個人或集體)形成時，性別是否在特定時刻中佔主導地位，仍和機遇有關，而非事先預定甚或可預測的。數十年來逐漸累積的優良作品——這些作品在我的研究現況文章中已述及(如果不是已詳細分類的話)——已向我們展現了一些結合其他問題的好問題。但這仍未也不應給我們一個尋找答案的公式。

5 「……維持性別作為一個具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範疇，而非規範性或名義上的範疇，並且維持女性研究作為一個在思想上和體制上的激進場域，而非規約性場域——簡言之，拒絕讓性別和女性研究受到規限——這些關注和拒絕，就與斷言女性研究為一個融貫的研究領域的作法截然不同。」Brown, 1997: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

6 Brown, 1997: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

若我們要求一個強力的滲透性， 我們可以將何種新問題帶進視野呢？

第二項由那位人類學家所提出的挑戰是：接下來該做些什麼呢？與一個既定的研究範疇脫勾——「研究中國女性的學者要如何填補我們認知的縫隙？」——這變成一個較不具規範性，甚至是不幸的暫時性問題——「現在如何？」換言之，我們也可繼續問「發生了什麼事？」同時留心以下另外兩個問題（它們使第一個問題得以定位卻又動搖）：甚麼人和甚麼過程製造了且留下讓我們用以提供答案的材料？又何以我們現在要了解？與其限定論題，我寧可提出五項思考的習慣，它們可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擬訂我們的論題。

1. 瞭解國家邊界的模糊性

在我最近關於中國農村集體化的性別化記憶的作品內容中，⁷ 我認為Timothy Mitchell所謂的「國家效應」(state effect) 特別有用——並非「國家的作用」(effect of the state)，而是這效應如何「被創造出來從而使發生的事情某些方面歸於社會，而其他則分出來作為國家？」(Mitchell, 1991: 89) 他建議：

作為現代制度特徵的空間和功能的精確規定、把這些功能納入層級布置的協調作用、指導和監督的組織、將時間規劃成日程表和節目表的行動等，皆有助於一個看來包含的不是社會實踐的合成物，而是二元秩序的世界的建構：一方面是個人及其活動，另一方面則是一個毫無生氣的「結構」，多少與個人分離，先於個人，包含且提供個人生活的框架……我們不應以之為真實的結構，而應以之為強而有力的，顯然是形而上的實踐效應來檢視之，此種效應使這種結構得以存在。⁸

7 對此研究的進一步討論，以及這裡所見的Mitchell兩個引文和註釋，參見Hershatter, 2002.

8 Mitchell, 1999: 89. Mitchell的分析針對戰後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通過國家和「私

我們需要持續關注國家論述如何在貫徹中被修飾、挪用，甚至完全重構，尤其是當這些活動指向不明確的國家界限，以及製造和維持這些界限所需的工作。例如，婦女聯合會（婦聯）通常被理解為黨國政策傳達至女性群眾的單向傳輸帶。仇乃華認為，在五〇年代，服務於婦聯最高層級的女性，事實上在政府高層裡推動對女性的更多關注，以及我們現在所謂的政府創議對性別的特有影響 (Zhang, 1996)。王政最近關於城市居民委員會的研究顯示，「具不同背景和動機的女性都參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製造，同時自身也被製造為新的國家主體」(Wang, 2005: 207)。Lisa Rofel 關於經濟改革對杭州三代絲廠女工的意義一書，指出國家和國家創議的意義如何當場被重構、修正或窒礙 (Rofel, 1999)。我自己對婦聯在縣和地方層級的活動的研究顯示，地方婦聯幹部通常在極少的資源和國家支持下運作，以特別針對農村女性的情緒高漲「社會運動高潮」模式來進行——耐心培育地方領導，改善女性的健康和在家庭中的地位等等。這些活動並不反對國家論述——的確，它們充分參與其中，而它們在與更大的國家目標相連結時最為有效，例如為了集體農業生產而動員女性。然而，在著重點或內涵上，它們與其他機構所表述的國家政策並非完全一致。有時，它們借助國家論述來取得珍貴的國家資源，以求為女性發揮直接有利的實際作用。

此種進程最近的例子是素質或人類品質的論述，將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不幸歸咎於其人口品質的低劣，並呼籲加強提升品質的工作。在許多場合裡——工作場所、黨、家庭、和學校——素質論述將從前被視為集體性的社會計劃，轉變為個人努力和責任。尤其在女性方面，其低下的地位甚至受虐的遭遇，被理解為個人改善現狀的責任，若非全然是她自己的錯。在某些方面，女性素質低劣的討論乃重拾梁啟超的牙慧：

人」機構的連鎖關係，另一方面通過「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經濟」間的自然主義化分離。儘管我從它原來的文本中斷章取義，我發現他的著述對思考社會主義政黨／國家，和被認為是「群眾」的部份差異化實體的產生有幫助，而在「群眾」當中，女性（或「作為國家主體的女性」，參見Tani Barlow的系統性闡述 [1994]）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病徵至少部份可用女性地位來解釋。儘管將素質私人化至個人層次，是對梁氏先前言說的一種重要但非全然有益的悖離。然而，婦聯從素質的角度製訂某些計劃，仍為地方經濟活動和有利於女性的訓練計劃爭取到國家資源。

2. 質問基層的歷史遺漏了誰？

雖然有關文革的回憶錄在過去二十年內大量製作生產，20 世紀中任何時間都極少出現中國女性傳記。城市勞動女性和各個階層的農村女性，被歷史學家當作群體來處理，而菁英和知識女性卻幾乎從未出現。與中共立場不同的女性，例如致力於爭取投票權或在國民黨中工作的女性，或因勞動或學業而出入中國的女性淡入或淡出（大多淡出）研究的視界。然而，在我們急於鑽探「此一領域」中研究不足的角落之前，我們至少得先問兩個問題。首先，迄今為止這類作品的相對缺席，給了我們有關歷史探索的形成（民族主義敘事，中國共產黨敘事，重新發掘基層女英雄的女性主義計劃，大量的文獻資料）甚麼啓示？第二，傳記作為一種方法，是否可能或有希望既奠基於那些早期研究之上（討論參政權卻不理軍閥政治是愚蠢的），又同時中斷它們（通過引入那些包括但非止於性別的個別主體形成模式）？

3. 質疑環繞斷裂處組成的編年和敘事

到目前為止，女性史研究有兩個重要的重心：帝制時期，尤其是自宋代以後；以及 20 世紀革命時期。介乎這兩段時期之間的是大部份尚未被述及的 19 世紀，它也是國家形式（及其與歷史書寫的糾結）首次達到巔峰的時期。女性在 19 世紀遲遲才現身，且在梁啓超和他人所述有關文明墮落和改革需求的故事中，以常見的角色出現。

如我先前所述，高彥頤質疑儒家／壓迫的五四故事已有一段日子了，她問現代史家，我們是否真要將一個在特定危機時刻所製作的令人非信不可的敘述，錯認為一種關於帝國晚期性別的有用說明。高彥頤的晚明研究 (Ko, 1994)，以及曼素恩對漫長 18 世紀的研究 (Mann, 1997)，（在其他成就之外）顯示出為了製作五四論述，多少江南才女的滿腹學識

和出版活動不得被遺忘。同時，Paola Zamperini (2003)、葉凱蒂 (Catherine Yeh, 1998)、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2001) 和其他學者考察 19 世紀晚期有關名妓的書寫，有助我們看到這個特殊群體如何以多種方式被表述 —— 以及也許自我表述 —— 表述為一個已消失世界的化身，但同時又體現了新時尚、新商品化性關係、新汽車以及其他物質和慣例，它們意味著對具地方色彩的現代性的一種試驗。季家珍 (Joan Judge, 2001, 2002, 2003) 和胡纓 (Hu Ying, 1997, 2000, 2001, 2002) 等人最近的作品，已將女性革命活動的產生時刻，和女性作為國家象徵的表述，追溯至清代最後十年，也許是 19 世紀最後的時刻。

我們也許可將此種性別史的新學問設想為一種鉗形攻勢 —— 將具有學養的女性的故事往前推到 19 世紀早期，將摩登女郎和革命分子的故事往後推到 19 世紀晚期。我們有許多專題研究和一些架構，但在此卻缺乏一部 19 世紀的歷史。在我任教的一門關於帝國晚期至今日中國的性別問題的研討班上，當課程按大綱進行到差不多一半時，我和我的學生總是要嘗試通過一個感覺上像黑洞或令人眩暈的墜落的時段，那正是 19 世紀所處的位置。

在曼素恩對 18 世紀和季家珍對 19 世紀末的研究之間，肯定有事發生。的確，我們可以回到那個為人珍視又生生不息的「女性也在那裡」研究計劃去。的確，至少那些兵工廠創辦者、自強運動參與者、移民拓荒者、語言改革家、科學實驗家、太平天國謀反者、捻亂分子、義和拳民、流離失所的挑夫、鴉片走私者和買辦，皆在家居生活中曾與女性同處。(我們確實看到太平天國改變女性地位的舉措和紅燈照 —— 但我認為該是時候超越我們兩三個重複的舉隅式練習，並嘗試獲得更具體、變動和混雜的東西)。此外，將女性重塑為寄生的、受壓迫的、壓在國家之上的死氣沈沈的重擔，不可能是完全出自梁啟超腦袋的做法 —— 它孕育於某處，或好幾個其他地方。我們知道遠在晚清之前，女性已是社會危機強而有力的比喻，但 19 世紀的情形有何特殊之處？女性寫了和做了些什麼？她們因何又如何被書寫和對待？當女性（歷史的緩衝主體）被重述時，男性和男子氣概又如何呢？若性別被置於中心，或至少出現在

畫面中，我們關於 19 世紀歷史關鍵要點的漢學常識，將會發生甚麼變化呢？

4. 注意性別對於參與者來說關係重大之時，以及性別不再那麼重要的時刻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史中，性別經常成爲顯著的差異性軸心或身分認同重點，有時兩者皆是。例如，在針對女性愚昧無知的狀況以及改善的需要而寫成的晚清和五四的作品中，它是差異性的軸心。在民國時期女性參政團體中，它是身分認同的重點。當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在五〇年代建立婦女聯合會各支部時，它就變成了另一個認同點——成了 Tani Barlow 所稱的「作爲國家主體的女性」(Barlow, 1994)。因此當性別在論述中出現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它如何及爲何冒出來？誰賦予它表現力？是誰承認它或採納它，以何種程度的熱情，以及爲了什麼目的？認識到人們不只是採納一個標籤，且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不斷被重塑，我們便要問，性別如何在特定時刻有助於政治和／或個人主體性的產生？這問題當然要和性別對史家而言，何時成爲差異或認同的顯著軸心的問題分別開來，它使某些問題得以成立，但毫無疑問也模糊了其他問題。

同時，我們也要留意當性別作爲差異，或性別作爲認同不再那麼重要的時刻，並追問爲何及如何致此。在中國暴力鎮壓 1989 年的示威之後，周蕾 (Rey Chow) 寫道：

我聽到一位女性主義者問道：「我們該如何從性別的角度來解讀現在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我在以前和現在對此問題的立刻反應都是：「我們不這麼做，因為在震驚的時刻，中國人是去性別化的，而且變成只是『中國人』」。問我們如何使用性別的角度來「解讀」一場像現在這樣的政治危機，其實是堅持一個分析範疇的普世和永恆的有效性，忘卻了伴隨著所有範疇的解釋力量的歷史性……當中國支持民主的抗議人士因爭取自由的和平示威而遭到逮捕、懲罰或殺害時，任何以單一範疇分

析中國情勢的論述，都是自大而傲慢的。問題不在於我們該如何從性別的角度來解讀現在正在中國發生的事，而是當性別作為一個範疇，尤其當它涉及所謂的第三世界時，發生在中國的事情能告訴我們什麼？什麼是性別的限制？它在哪裡奏效，又在哪裡無效？(Chow, 1991: 82)

我這麼說並非要否定「女性也在那裡」(誰能忘記柴玲?)或「女性被用於象徵性的用途」(猶記民主女神)，亦非排除後六四的鎮壓行動，具有性別面向的可能性：例如，軍事化國家的男性主義，或失蹤者家屬在母親悲痛的標誌下，組成的非正式和冒險性的組織(最後，也不是把「只是中國人」的範疇視為跨越時間而一貫的)。我們要認識到的是，當這運動的日常動力開展時，以及當它被記憶時，它既不**關乎**性別(在意識形態的意義上)，亦非透過性別化的動力來**演練**，也不是被**重述**為性別具有重大意義的時刻。若性別如 Joan Scott 所言，「是一個有效的分析範疇」，它也只有在被靈活應用的情況下才能繼續如此。要為「女性無所不在」或無標記的男性(在論述意義上說)不過是個性別化的實體而立論，是個開始而非結束。女性主義學者時常將性別退場之時，解讀為背棄的時刻(國家出賣女性)，或解讀為獻身於更大更重要的真理之時(當解放軍開火時，性別已變得無關重要；唯有身為中國人或人類在此刻才事關重要)。與其痛斥拒絕接受性別範疇的人，或責難時刻堅持其重要性者，我則願意看見我們能重構此問題。如果性別是個用來建構意義的範疇，我們需要追溯何時和由誰來運用或摒棄它，同時注意它如何和為何與其他範疇糾結不清，或被其他範疇所替代。

5. 對作為現代性範例和他者的(大寫)女性的置換作出評估

對於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作為學者的我們，性別在有關國家的論述中的作用，部份仍是當代性別所發揮的。學者和社會活躍分子探問以下問題：改革對女性是好是壞？性表現無所不在的新現象，或者在性特權中的明顯等級，是否父權復活的表徵，或全球化模式中的現代性，或兩者皆是？但是其他從屬群體亦逐漸以類似的方式為人所用。最近(自改

革以來，但在過去五年尤為強烈），「農村」——也就是農民——以拖累中國的問題形象出現。若梁啓超將女性描繪為寄生蟲，那麼 1988 年的電視集「河殤」則將齒搖髮禿，堅持子孫滿堂的老農民，描繪為中國發展的主要威脅，是偏狹的「黃」（相對於世界主義的「藍」）文明的體現（Heshang, 1988; Su, 1991）。（其公式化的闡述是這樣的：為何我們的革命走錯了方向？因為五四方案被一個無知農民攔路截劫了，這個農民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在領導階層充滿農民的黨中保有權力，並且更廣泛地說因受全中國的無知農民崇拜而掌權）。儘管「河殤」被政府禁播，事實上官方論述與其取徑極相似。農民如同在五四故事中的女性，既是受害者也是問題的具體化身。他們需要提升；他們的品質需要改進，他們需要改變為有價值的國民，也就是國家的血脈。同時，對部份新左派分子而言，農民、國家製造和容忍存在的不平等、他們所遇到的不公不義，正是改革出錯的那種徵狀。在此，有人也許會辯駁說，正是他們的地位，而非女性的地位，成為正式評估中國表現如何的首要項目——他們的而非女性的缺點、脆弱、短處和受害犧牲，才是理解中國現代性和中國前途的中心符號。

對中國和女性主義學界來說，這也許不是壞事。「農民」需要這樣的關切。我們當中有些人正不得不介入對農民範疇的干擾，追問多年來的性別研究使我們熟習的問題：「農民」是個單一範疇嗎？它是具性別的嗎？（或者，重提一個更早、更粗略，但仍有用的問題：女性在哪裡？）是否有地方性的差異？是否有歷史的特殊性？「農民」此範疇在當代論辯中有何作用？這作用如何與日常生活、物質、隨時間而變化的問題相關——如果有關——？⁹簡言之，「性別作為方法」在干擾其他學術範式和政治陳述時也許有用，就像它干擾「作為歷史主體的未加標記的男性」的早期敘述一樣。但唯有當我們認識到「性別」和「農民」是主體化的不同方法才會繼續有用；我們不能將每個主體產生的方式化約為相同的創造過程。

9 Alexander Day 撰寫中的論文在形塑我對此論題的問題方面至為重要，謹此鳴謝。

同時，取代大寫女性作為中國國族危難或成功的中心表徵的做法，可能為思想、學術和行動提供其他可能性。也許，擺脫了代表中國的中心象徵的負擔，女性 —— 甚至大寫的女性 —— 在新的學術分析模式 —— 以及行動方案 —— 中，終會有其他可能性。這些模式和方案能充分考慮到國家及其重要性，卻不受其驅使。

—— 紀念 Jan Stackhouse (1952-2005)